

中國對東盟的外交： 一種建構主義的剖析



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外交，始於1950年1月18日中國與越南建交，至今只有五十九周年，但掛年則為六十年。在本文中，「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的外交」、「中國對東盟國家的外交」或「中國對東盟外交」等表述，均指中國對東南亞十國的外交政策與行為。在1990年之前，主要是國與國之間的雙邊關係；在1990年之後，則兼具對東盟整體的外交政策與行為，典型例子是「10+1」（東盟十國+中國）體制的建立。

從國際關係理論來透視，中國對東盟一個甲子的外交，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種視野：

第一，現實主義視野，大部分的中國外交研究屬於此類^①。這些學術著作主要是從權力政治視野分析中國的外交政策與行為，強調意識形態、階級鬥爭在中國外交中的作用。目前尚未見到有關專著，有關中國對東盟外交的研究只是這些著作中的一些章節。現實主義視野比較好地解釋了1950至1979年間中國對東盟的外交政策，但無法解釋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身份變遷與對外政策變化：在國際與地區權力結構沒有發生明顯變化的情況下，中國為甚麼會出現國家利益的變化並調整外交政策？

第二，新自由制度主義視野，即從區域整合、多邊主義、地區主義、地區化等角度分析中國對東盟的外交。這類研究的核心假設是「合作有益」，而經濟與文化上的多邊合作、區域合作通常是其分析的重心^②。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分析通常集中在1990年以後的時期，探究中國對東盟外交中採取的主動行動，包括促進地區經濟合作、提供地區公共產品、放棄以戰爭來解決彼此間的爭端等。但對於此前的中國外交，則較少從理論上予以解釋。人們會追問：新自由制度主義能否解釋1950至1979年間中國對東南亞的外交？國際制度如何影響這一時期的中國外交？這一思路恐怕對1980年代中國對東盟的外交都難以解釋。

第三，建構主義視野，這是年輕一代學人常用的理論視野，旨在分析中國身份的變化如何導致了對東南亞國家外交的變化。雖然這類著作尚未獲得可與前一類作品相比肩的影響力，但其中的一些學位論文與學術文章經常被同行引

建構主義視野旨在分析中國身份的變化如何導致了對東南亞國家外交的變化，它不但能解釋後三十年，也能解釋前三十年中國對東盟外交，與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相比，更具有說服力。

用，從而產生了一定的學術影響^③。這類著作展示出國家身份變化的原因、這種變化對國家外交的影響，以及觀念因素在中國外交(尤其是東亞整合)中的作用等，彌補了前兩類研究者把國家利益與國家身份視作給定因素的不足，較好地解釋了近三十年來中國的外交政策，尤其是1978至1982年間中國的身份變化與外交政策變化之間的因果關係。但是，我們很少見到學者用建構主義視野分析1950至1979年間中國對東盟國家外交的文章。在這個問題上，建構主義是否像新自由制度主義者一樣被難住了？

本文將顯示，中國身份的變遷其實貫穿了一個甲子，並且不斷地引致對東盟國家外交的變化。由此，本文試圖說明，建構主義不但能解釋後三十年(1979-2009)，也能解釋前三十年(1950-1979)中國對東盟外交。這昭示着，與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相比，建構主義在解釋中國對東盟外交的歷史上，更具有說服力。

一 建構主義的概念與理論

建構主義的核心邏輯是：行為體的身份並非一成不變，它是被建構起來的；身份決定着行為體的利益，利益決定行為體的行為。這一思路顛覆了物質主義，卻張揚了社會世界(social world)的固有特徵。社會不再是理性主義者的物質本體，物質利益不再決定行為體的行為，文化或共有的觀念(shared ideas)成了社會本體，決定着物質的意義，進而左右了行為體的行為。因此，國家利益也不再是給定不變的。而且，建構主義者堅信人類社會進步的可能，否定國際體系存在固定不變的無政府邏輯，並認為國際社會至少包括三種文化：霍布斯(Thomas Hobbes)文化、洛克(John Locke)文化、康德(Immanuel Kant)文化。民族國家體系的出現意味着人類開始超越霍布斯文化，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人類社會大致上已經度過了霍布斯文化而處於洛克文化佔主導地位的階段，部分地區正在邁向康德文化^④。

在過去的六十年裏，中國的外交政策幾次作出大幅度調整，以致有「中國外交十年一變」之說^⑤。按照現實主義者的觀點，國家利益(尤其是核心利益)通常相對穩定，不大可能如此頻繁、劇烈地發生變動，因此，現實主義理論很難解釋中國外交政策六十年間多變的現象。新自由制度主義關注於國際制度對行為體行為的影響與國家的絕對獲益，這同樣很難解釋在國際制度沒有發生大變化的情況下，中國的對外政策為甚麼卻屢屢進行大幅調整。而建構主義理論將展示，正是因為中國自身身份的變遷，導致國家利益(尤其是核心利益)發生變化，從而促使中國外交政策與行為的變化，對東盟國家的外交也是如此。

中國國家身份六十年的變遷軌迹是：從帶有國際主義國家色彩的民族主義國家轉變為帶有地區主義國家色彩的國家。但這一變遷並不是直線式的，而是在一定時期存在着反覆。原因在於，中國的政治體制決定了中央領導人(尤其是最高領導人)的觀念通常是中國國家身份的主要決定因素；因此，領導人的更替

中國國家身份六十年的變遷軌迹是：從帶有國際主義國家色彩的民族主義國家轉變為帶有地區主義國家色彩的國家。但這一變遷並不是直線式的，而是在一定時期存在着反覆。

會導致國家身份的變化，而同一領導人觀念的變化也會導致國家身份的變化。在與國際社會互動時，不同領導人或者同一領導人在不同時期會在民族主義、國際主義與地區主義三者中搖擺，中國國家身份因此發生變遷，並導致國家利益與外交政策的變遷^⑥。

民族主義國家，就是以一個或多個民族為基礎成立的民族國家，堅持這一身份意味着突出強調民族權利，如獨立、領土、主權等。而堅持國際主義國家的身份，就是突出強調中國是一個重視國際義務的社會主義國家。其實，許多社會主義國家都經歷過這個時期。所謂地區主義是一種關於國家合作的信念與實踐，它主張地理位置相鄰的若干國家進行日益深入的合作，以應對全球化的壓力，並增進自己的利益；堅持地區主義國家的身份，多強調地區合作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性。

1979年是一個歷史分水嶺。在這一年，中國從毛澤東—華國鋒時代比較封閉的民族主義國家，轉變為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時代日益開放的民族主義國家。這是共和國六十年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身份變遷。除此之外，中國還經歷了幾次相對不那麼引人注目、但非常重要的身份變遷，這些變遷同樣影響到中國的外交，包括對東盟國家的外交。

1979年3月對越自衛反擊戰事實上構成了中國外交政策的分水嶺；從那以後，中國大致上放棄了以武力解決國家爭端的外交政策，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線得到了全面的貫徹。

二 改革開放前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的外交

本文把1979年3月確定為中國對東盟外交兩個三十年的分界點，主要的原因在於對越自衛反擊戰發生在中國與一個後來的東盟國家(越南)之間。那場戰爭事實上構成了中國外交政策的分水嶺；從那以後，中國大致上放棄了以武力解決國家爭端的外交政策，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線得到了全面的貫徹。

在建國初期，毛澤東確定了處理國家間關係的三大方針分別是：「另起爐灶」、「一邊倒」、「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這三條方針服務於中華民族的利益。1954年，中國與印度、緬甸共同倡導了處理國家間關係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儘管在實際執行時存在彈性，但這五項原則總體上屬於中國長期倡導的外交原則。這裏顯示的是民族利益的至上性，國際主義隱而不彰。

在前三十年的中國外交實踐中，地區主義國家的身份不佔有重要的地位。民族主義國家的身份是基調，當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發生衝突時，通常是前者「佔先」，但這一點不能絕對化。下文的分析將顯示，國際主義在一定時期也受到相當程度的重視，甚至成為決定國家身份與外交政策的關鍵因素之一。

在這三十年中，現在的東盟十個成員國大致上分為兩個集團：一邊是美國支持的菲律賓、印尼(蘇哈托[Suharto]時期)、新加坡、馬來西亞、汶萊、泰國(以下稱為「東南亞集團」)；另一邊是蘇聯支持的越南、老撾、柬埔寨(越南侵略柬埔寨時期)(以下稱為「印支集團」)。在此期間，緬甸一直處於自我封閉狀態，並與蘇加諾(Sukarno)時期的印尼、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親王時期的柬埔寨共同致力於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在兩極對抗的世界體系

中，中國在東南亞所能發揮的作用相當有限。除了少數時期，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關係是：大部分時間是對手，互相防範與利用的痕迹很明顯；少部分時間關係比較友好。這三十年可以進一步分為三個時間段：

(一) 1950-1960年。1950年1月18日，中國與越南建立外交關係。1960年6月24日至26日，在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舉行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中蘇兩黨矛盾公開化，眾多兄弟黨不得不在中蘇之間做出選擇，支持中共者只有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蘇關係的公開破裂對中國的身份認定與外交決策都有重大的影響。這一時期中國的身份是：(1) 國際主義國家：強調社會主義大家庭成員的互相支持與幫助，這是針對與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但中國不能容許別國(主要是蘇聯)危及自己的核心民族利益；(2) 民族主義國家，這是針對已經獨立的非社會主義國家。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國理論上支持其民族解放運動，哪怕這些運動是由當地的民族資產階級來領導，但實際上中國僅僅支持了少數國家裏共產黨領導的民族獨立運動。

中蘇公開衝突之後，中國認為蘇聯已經變修，成為世界革命的敵人，中國應該扛起世界革命的大旗，領導全球的反帝、反殖、反修。因此，中國對美蘇兩霸的政策是「兩個拳頭打人」。

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的外交也是基於上述原則。這一時期，東南亞國家中有親西方的菲律賓、馬來亞聯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泰國與南越，這些國家因為「恐共」而與西方進行防務合作以「阻止共產主義擴張」；有屬於社會主義陣營的越南民主共和國(北越)；還有主張和平、中立，後來主張不結盟(1961年發展為不結盟運動)的印尼、緬甸和柬埔寨^①。馬來亞半島、沙撈越、北婆羅洲(通常指沙巴)尚處於英國的殖民統治下。馬來亞聯合邦1957年8月獨立，1963年加上沙撈越、沙巴與新加坡組成馬來西亞聯邦(Federation of Malaysia)。新加坡原為英國直屬殖民地，後於1965年8月9日退出馬來西亞聯邦獨立。老撾在1946至1954年由法國控制，1954至1962年則是由美國主導。

因此，這一時期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的外交主要面向四個國家：1950年1月與越南建交，4月與印尼建交，6月與緬甸建交；1958年7月與柬埔寨王國建交。幾大亮點是：1954年與緬甸倡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同年參加關於恢復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內瓦會議；1955年參加印尼、緬甸等五國發起的萬隆會議。

這一時期中國在東南亞國家外交中的形象，對於印支半島的共產黨國家或共產黨勢力比較強大的國家來說是國際主義國家；對於印支半島與東南亞的民族主義國家來說是友好的民族主義國家；對於跟着西方走的民族主義國家或殖民地來說，中國則是社會主義陣營內的一個國家。

(二) 1960-1968年。中蘇公開衝突之後，中國認為蘇聯已經變修，成為世界革命的敵人，世界革命的中心轉到了中國，中國應該扛起世界革命的大旗，領導全球的反帝、反殖、反修。因此，中國對美蘇兩霸的政策是「兩個拳頭打人」。同時，為了衝破蘇、美、印、日、韓、台多個敵對勢力的包圍，中國決定通過輸出革命、扶持亞非拉國家的獨立運動來壯大自己的力量。

就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的外交而言，在1960至1966年間還相對理性，取得了一些成果，如1961年4月與老撾建交；1962年，在日內瓦會議上，中國代表團提出以1954年《日內瓦協議》(Geneva Accords)為基礎和平解決老撾問題的五項原則，為會議成功做出了貢獻，會後更支持蘇發努馮(Souphanouvong)親王與富馬

(Souvanna Phouma) 親王組成聯合政府。但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毛澤東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即脫離實際，推行的「革命外交」左傾冒進，從而造成嚴重的後果——東南亞國家覺得「黃禍」未去，「紅禍」又來，結果多年沒有國家願意與中國建交，印尼甚至在1967年10月與中國斷交。

(三) 1969-1979年。輸出革命的政策讓中國外交「烽火四起」。1969年3月發生的珍寶島事件，以及同年8月發生的新疆鐵列克提事件，讓毛澤東意識到了與美蘇兩霸同時為敵的巨大危險，並進而調整對外政策。由此，在大國關係上，中國對民族利益的考慮超過了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重視；對中小國家的外交，革命外交的色彩已經弱化，不再強調輸出革命與推翻資產階級政權，而是在「三個世界」理論的指導下，強調自己的第三世界國家身份，對於自身的亞洲國家身份則很少提及。這時期中國的身份，是帶有國際主義國家色彩的民族主義國家，但這裏的國際主義與前一階段相比，無產階級的色彩變淡，似乎帶有少許世界主義國家的味道。

在對東盟國家的外交上，中國1974年5月與馬來西亞建交，1975年6月與菲律賓建交，7月與泰國建交。同年，中國正式承認東盟的存在。1978年11月，鄧小平訪問東盟三國：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訪問期間，鄧小平強調中國政府和人民願意加強和發展同東盟國家的友好關係，以及建立經貿和科技交往關係。

然而，中越關係的轉折點是1969年胡志明去世與中美關係緩和，1975年越南南北統一後中越關係更加日益淡化。1970年，由美國支持的朗諾 (Lon Nol) 集團推翻了西哈努克親王在柬埔寨的統治，中國則支持後者在北京成立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和王國民族團結政府^⑥。同時，中國支持紅色高棉 (赤柬) 與西哈努克親王捐棄前嫌，攜手抗美，推翻朗諾政權。中國對紅色高棉「三年八個月」(1975年4月至1978年12月) 統治期間的極端極權主義做法持保留態度，並進行了勸說，但成效不大。1978年12月越南入侵柬埔寨後，中國支持西哈努克親王、宋雙 (Son Sann)、喬森潘 (Khieu Samphan) 三派抵抗力量實行聯合，對抗越南及其扶持的韓桑林 (Heng Samrin) 政權。

1979年2至3月期間爆發的對越自衛反擊戰是中國對東盟外交中的一大事件，並構成中國外交政策轉型的時間標誌。戰爭發生的直接原因是1978年12月越南對柬埔寨的入侵，但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美蘇兩極對抗大背景下中國對國家安全的關切。美國也不希望蘇聯勢力在中南半島進一步擴張，因此對中國的行動予以默許。東盟對中國的行為給予了事實上的理解，因為當時的東盟成員國出於對自身安全的關心，也反對越南對柬埔寨的侵略。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毛澤東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即脫離實際，推行的「革命外交」左傾冒進，使東南亞國家覺得「黃禍」未去，「紅禍」又來，結果多年沒有國家願意與中國建交，印尼甚至在1967年與中國斷交。

三 改革開放後中國對東盟的外交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從自我封閉走向對外開放，從國際體系的革命者變為建設者與改進者，主要是因為領導人的更替。1978年年底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標誌着中共的工作重心從階級鬥爭轉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生這一巨

大的轉變，主要是因為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已經開始主導國家大政方針的制訂，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是鄧小平外交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⑨，這一思想在對越自衛反擊戰之後得到了比較有力的執行。這場戰爭可以被看作前三十年外交政策慣性在起作用，是毛澤東「一條線」外交戰略的繼續與尾聲。

中外學者對1979年以來中國身份的論述比較一致：從「體系外」的革命國家變成積極融入現有國際體系的「負責任大國」。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並進一步發展，中國在這三十年間的外交戰略也經歷了調整：1980年代是「獨立自主」；1990年代為經濟建設塑造「和平環境」；新世紀的頭二十年將變為謀求同亞洲與世界「共同發展與安全」的戰略^⑩。

從民族主義國家、國際主義國家與地區主義國家的框架看，中國已經漸漸放棄了國際主義國家的身份，而在長期固有的民族主義國家身份中，地區主義國家的色彩愈來愈濃。與前三十年一樣，後三十年的中國外交仍有「十年一變」的痕跡，但這一時期的幾次外交調整是在中國身份大致不變的前提下，朝着一個方向擴展既定的外交政策與行為。如果說第一個十年中國還處於身份摸索與認定期的話，後冷戰時期的二十年，中國日益強化自己的地區主義國家身份，並在第二個十年初步擺脫了「十年一變」的窠臼。預計中國外交將在冷戰後的第三個十年完全擺脫「十年一變」的特徵，走向穩定與可預期的新時代。

(一) 1979-1989年 (轉折期)。1989年11月柏林牆的倒塌被視作東西方冷戰終結的開始，同年「六四」風波對中國外交政策與行為也有明顯的影響。另外，越南在佔領柬埔寨十一年後，終於在這一年撤軍，「東南亞集團」與「印支集團」由對抗走向和解。中國與東盟國家的外交也進入調整期：由「支持一方」轉向「全面接觸」。

在毛澤東—華國鋒時期，中國把自己的身份界定為革命國家，奉行一種對抗性外交，以此來鞏固和擴大民族利益。在鄧小平主政的1980年代，中國對外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力圖為經濟建設創造和平環境，不再強調國際主義國家的角色，但在外交上仍然習慣於雙邊主義。在區域合作問題上，中國多持觀望態度，仍不習慣於多邊主義與地區主義的理念與實踐，地區主義國家的色彩比較弱。這一時期，中國除了維持民族主義國家身份之外，處於以地區主義國家取代國際主義國家色彩的轉折期。

在這一時期，中國對東盟外交的重要背景是：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從「經濟服務於外交」變成「外交服務於經濟」，從而減輕了東盟國家對中國向外擴張的疑慮；作為全面貫徹「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中國最終放棄了對東南亞共產黨的支持，這進一步減少了影響中國與東盟關係的障礙；中日、中美關係正常化，促成當時的東盟成員國開始調整對華政策。

在整個1980年代，促成中國與東盟合作的一大平台是柬埔寨問題。在解決柬埔寨問題的過程中，中國與東盟六國（汶萊1984年1月加入）互相支持與配合，促成了《柬埔寨和平協定》最終在1991年的簽署與實施。1979至1989年間，中國與東盟的頻密互動大大加深了彼此之間的了解，消除了歷史上積累下來的疑慮；經貿合作不斷擴大、文化聯繫大大提升。1988年11月，李鵬總理訪泰期間宣布了中國政府建立、恢復和發展同東盟各國關係的四項原則，其中第四條就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減輕了東盟國家對中國向外擴張的疑慮；作為全面貫徹「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中國最終放棄了對東南亞共產黨的支持，進一步減少了影響中國與東盟關係的障礙。

提到支持建立「東南亞和平、自由和中立區」的主張，尊重東盟各國建立東南亞無核區的願望，支持東盟各國間的合作，並願與東盟各國一起為東南亞的和平與發展而努力^①。

總之，這十年是中國與東盟關係的轉折期，而柬埔寨問題成為中國參與多邊合作與地區整合的一個重要實踐，加深了中國對多邊主義與地區主義的了解，樹立起繼續參與多邊合作與地區整合進程的信心。

(二) 1990-2009年(參與期)。在這一時期的開始，中國對於參與多邊機制與區域整合，依然處於稍顯被動與勉強的接受期。以1997年7月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為契機，中國開始展示自己的「負責任大國」身份，並調整自己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對東盟國家的政策，因而成為國際多邊機制的積極參與者與東亞地區整合的積極推動者。但是，基於「韜光養晦」的外交原則，加上中日無法在區域整合中像法德那樣共同發揮領導作用，而東盟又積極推進東亞整合，因而中國支持東盟坐在東亞整合的「駕駛席」上。

江澤民主政時期，中國繼續強調國家利益的維護與擴展，但也開始強調自己作為亞洲一員的身份。而作為崛起中的大國，贏得鄰國信任的一個有效舉措，就是參與構建愈來愈多的地區性合作制度並把自己融入其中^②。因此，多邊主義與地區主義理念被漸漸接受，多邊合作與地區整合切實啟動。於是，中國逐步把東盟當作自己實施多邊外交政策的一大窗口與平台，許多新的外交政策首先在這裏提出與實施^③。

胡錦濤主政以來，中國在外交上開始注重以建設性姿態佔領國際政治的道德制高點。在周邊外交上，2002年中共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的「與鄰為善，以鄰為伴」，以及2003年第九次東盟首腦會議上溫家寶闡發的「睦鄰、安鄰、富鄰」，實際上就是中國的亞洲戰略，屬於中國總體發展戰略的一部分。2007年，中共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進一步要求「加強同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和務實合作，積極開展區域合作，共同營造和平穩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贏的地區環境」^④。可見，胡錦濤主政以來，中國依然保持了民族主義國家的基本身份，與之相結合的是地區主義國家身份。中國作為國際主義國家的色彩已經很淡，取而代之的是愈來愈濃烈的地區主義國家色彩。

1991年，中國與汶萊建交，至此中國與所有東盟十國都建立了外交關係。這為中國強化自己的亞洲國家身份、參與東盟主導的東亞整合進程提供了一大動力：同年中國參加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參與APEC的自由化安排，並成為東盟的磋商夥伴；1994年中國支持創辦東盟地區論壇(ARF)並成為創始成員；1996年中國成為東盟的全面對話夥伴國，同年加入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CSCAP)；1997年中國與東盟通過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盟國家首腦會晤聯合聲明》，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睦鄰互信夥伴關係。通過幾年的合作，尤其是1995至1996年間東盟不但沒有捲入中國與美日之間因為李登輝訪美導致的緊張與衝突，反而組織中、美、日、澳開展年度安全對話以避免衝突升級，促使中國意識到東盟是地區安全合作上的建設性夥伴。因此，中國接受了安全相互依存的觀念，並在1996年的ARF會議上正式提出了「新安全觀」。通過這幾年與東盟的

以1997年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為契機，中國開始展示自己的「負責任大國」身份，並調整自己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對東盟國家的政策，因而成為國際多邊機制的積極參與者與東亞地區整合的積極推動者。

合作，中國明確感受到了參與東盟主導的包括安全議題在內的地區合作進程的價值，打消了一些原有的顧慮。這為中國在下一階段轉為積極參與地區合作（尤其是與東盟的合作）奠定了基礎。

1997年7月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保持人民幣不貶值，並向東盟國家提供低息貸款。這可能是中國首次明確察覺到自己的大國責任，意識到隨着地區主義的興起，作為蓬勃發展的經濟體，應該為本地區的穩定與繁榮採取切實、有效的行動，以促進地區整合。

在1997年12月召開的首次「10+3」（東盟十國+中日韓）會議上，中國領導人與東盟九國（柬埔寨尚未加入東盟）領導人就雙邊／多邊關係深入交換意見並發表聯合聲明，同意在各種地區與國家組織中加強合作，並確立了中國與東盟面向二十一世紀的睦鄰互信夥伴關係。2003年，中國作為第一個非東南亞大國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2008年以來的全球金融危機並沒有影響中國與東盟的合作進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投資協議》於2009年8月在曼谷簽署，標誌着中國和東盟自貿區談判圓滿完成^⑤。全球金融危機反而促進了中國對東盟國家的支持，2009年4月，中國外交部部長楊潔篪向東盟十國駐華使節通報了中國政府加強中國—東盟全面合作的八點設想和建議^⑥。

總之，1990年以來中國與東盟關係不斷深化，到2003年提升為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以東南亞金融危機為契機，中國與東盟的合作進入了新階段，雙方合作的領域與深度都大大增加了。政治、安全、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次第推進，隨着中國—東盟《投資協議》在2009年8月份簽署，中國—東盟自貿區將在2010年全面建成^⑦。此外，貨幣地區主義在東亞可能突破「常例」提早得到實行^⑧。東亞整合的快速進展，並不意味着中國不再是一個民族主義國家，而是說，中國意識到與鄰國的共同發展是自身發展的必由之路，在周邊外交上必須奉行「睦鄰、安鄰、富鄰」政策。因此，在地區整合的道路上愈走愈有力，中國國家身份中的地區主義色彩愈來愈濃。

四 總結

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與建構主義是國際關係理論的三大流派。就中國對東盟國家的六十年外交而言，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都只能解釋這一長時段中國外交的一部分，而建構主義則可以解釋全時段的中國外交。

中國對東盟外交發生變化的主要原因，既不是國際權力結構的變化，也不是國際制度的影響，而是由於如下原因：主要領導人的更替、主要領導人對外來威脅的感知發生了變化，以及主要領導人對國家責任的感知。這三者都可以歸結為：主要領導人的認知變化導致國家身份的變化，國家利益因此發生變化，進而導致外交政策的調整。

從民族主義國家、國際主義國家、地區主義國家三種身份看，這六十年裏，中國從帶有國際主義國家色彩的民族主義國家漸漸轉變為帶有地區主義國

1990年以來中國與東盟關係不斷深化，東亞整合的快速進展，並不意味着中國不再是一個民族主義國家，而是說，中國意識到與鄰國的共同發展是自身發展的必由之路，在周邊外交上必須奉行「睦鄰、安鄰、富鄰」政策。

家色彩的民族主義國家。在前三十年期間，中國是國際體系中的革命者；在民族主義國家這一底色上，國際主義國家的色彩時濃時淡，而地區主義國家的色彩在這一時期並不存在。當民族主義國家與國際主義國家兩種角色發生衝突時，通常是民族主義國家的角色勝出。在後三十年期間，中國是國際體系中的建設者，在民族主義國家的基調上，地區主義國家的色彩從無到有，並愈來愈濃，而國際主義國家的色彩在這一時期已經褪去。與地區主義相伴的還有全球主義，這一趨勢將日益強化，逆轉的可能性比較小。當地區主義國家與民族主義國家發生角色衝突時，仍然是民族主義國家角色佔優，但中國在處理這類角色衝突時，已變得愈來愈圓通了。

中國對東盟外交發生變化的主要原因，既不是國際權力結構的變化，也不是國際制度的影響，而是由於主要領導人的認知變化導致國家身份的變化，國家利益因此發生變化，進而導致外交政策的調整。

註釋

- ① 例如謝益顯主編：《中國外交史》，第一至四冊（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 ② 例如蘇長和：〈發現中國新外交——多邊國際制度與中國外交新思維〉，《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年第4期，頁1-6、〈周邊制度與周邊主義——東亞區域治理中的中國途徑〉，《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年第1期，頁7-14；尹枚：〈區域主義與東亞區域主義實踐——兼論中國的政策選擇〉（暨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3），主要是其中的第六章，即頁105-23。
- ③ 例如張雲燕：〈社會建構主義與東亞區域經濟合作〉（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4）。
- ④ 秦亞青：〈譯者前言〉，載溫特(Alexander Wendt)著，秦亞青譯：《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頁20。
- ⑤ 章百家：〈改變自己，影響世界〉，載牛軍主編：《中國學者看世界（中國外交卷）》（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頁22。
- ⑥ 需要說明的是，中國的身份首先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毫無疑義，但這與民族主義國家並非不兼容。本文試圖從另一個角度探討中國國家身份變遷的軌跡，以豐富學界對中國外交的認識。
- ⑦ 王士錄、王國平：《從東盟到大東盟——東盟30年發展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頁16-17。
- ⑧ 楊武：《當代東盟經濟與政治》（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頁217。
- ⑨ 張光佑：〈新中國外交五十年〉，《外交學院學報》，1999年第4期，頁33。
- ⑩ 楚樹龍：〈全面建設小康時期的中國外交戰略〉，載《中國學者看世界（中國外交卷）》，頁114-15。
- ⑪ 〈中國與東盟〉（2008年8月14日），雲南產權交易所網，www.cynee.net/bencandy.php?id=71。
- ⑫ 張蘊嶺：《中國與鄰國的關係》，未刊稿，頁19。
- ⑬ 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王逸舟教授提醒這一點。
- ⑭ 〈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上的報告〉（2007年10月24日），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4/content_6938568_10.htm。
- ⑮ 〈中國東盟投資協議推遲至今年8月在曼谷簽署〉（2009年4月12日），引自新浪網，<http://news.sina.com.cn/c/2009-04-12/030717591535.shtml>。
- ⑯ 〈楊潔篪稱中國將向東盟國家提供150億美元信貸〉（2009年4月13日），引自中國經濟網，www.ce.cn/xwzx/gjss/gdxw/200904/13/t20090413_18779863.shtml。
- ⑰ 〈中國將設百億美元投資基金用於與亞細安投資合作〉（2009年4月13日），引自第一金融網，www.afinance.cn/new/smzx/200904/190539.html。
- ⑱ 陳峰君、祁建華主編：《新地區主義與東亞合作》（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7），頁157-65。